

1-2-P61-2

国民党研究资料丛书

抗日战争时期 国民党战场

史料选编

编 辑 说 明

一、国内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战场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我们选编了这一时期国民党战场的历史资料，作为《国民党研究资料丛书》的一种，供国内从事史学研究者参考。

二、本书资料按重大战役分类。全书共六册：第一册：总述；第二册：从九一八事变到芦沟桥事变前；第三册：芦沟桥事变及华北战场、淞沪会战及南京会战；第四册：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第五册：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上高、晋南三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六册：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柳桂会战、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缅甸战役、日军投降。

资料均依时间顺序排列，原资料未注明时间者，均排在同类的最后。

三、选编的资料，原则上全文照录，不作改动，以保持资料原始面目。少数资料的某些段落如有重复，史料价值不高或内容不属本书范围者，予以删节，删节用省略号“……”标明。对有明显错误处或错误字，则用〔 〕夹注说明之。原文残缺或模糊不清的用□表示。原件无标点或标点不规范者，均由编者统一标点。

本书资料由杨树标、耿易、姚守中、王福年、徐绍全、陈启后、楼子芳分别选编、校释、撰写提要。限于我们的水平，加上掌握的资料有限，难免有错漏和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略论国民党的抗战

姚守中 耿 易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规模空前的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伟大战争，也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抗日战争所以能形成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与坚持分不开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与坚持的。它的特点在于：国共两党在组织上是各自保持对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组织的领导作用，去共同进行抗日战争；同时对那些与共同抗日有关的问题进行协商，以求得解决。因而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不仅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战场，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而且还应研究国民党的抗日主张及其领导下的正面战场，研究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样，才能全面地、科学地反映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抗日战争。

为了“知己知彼”，我们在研究国民党的抗日主张及其领导下的正面战场时，就应借助于国民党所编著的有关抗战史料（当然也包括一部分港台学者的有关论著）。虽然在这些史料与论著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抹杀与歪曲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中作用，夸大和美化国民党抗日的宣传。但只要我们对这些史料

与论著本着“去伪存真”、“去芜取精”的科学态度，还是可以从其中提炼出有助于科学分析国民党抗日的材料的。这也是我们选编抗日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的目的。

下面就八年抗战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作一个概要的评述，并就史料谈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以求教于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同行们。

(一)

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野心是由来已久的。1931年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是它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1932年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战争，继而又于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

在上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首先发出抗日主张，在东北组织了抗日游击队，1935年又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政策。在这过程中，党还组织、发动与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国民党起了分化。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官兵奋起抵抗；1933年日军侵略魔爪伸向热河、察哈尔时，国民党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与共产党人吉鸿昌等合作，组织了察绥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主张联合抗日，收复失地。

当时的国民党与蒋介石，却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1932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内政会议的演讲中说：“我们若要研究九一八祸患是怎样起来的，当然在我们的内政方面有很大的关系”。“我国的内政有两大毛病：一种是党及政府内部分裂；一种是土匪、赤匪在各地地方扰乱，这使得我们国家分崩离析，国不成国”。因此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在这

个反动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在武汉成立了“剿匪”总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六十多万兵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则采取妥协政策。1932年5月31日，由何应钦派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茨签订的《塘沽协定》就是一例。该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与热河的合法性，同意了冀东为“非武装区”。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全国出现了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加之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向国民党提出了统治华北的要求，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加剧了与国民党矛盾，这就不能不使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发生若干变化。

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对外关系演说中，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表示日本侵略如超过“和平之限度”，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此又作了进一步说明：“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同年9月15日、16日、2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举行的会谈中，提出了五条关于调整邦交的希望条款，其中包括取消上海、塘沽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和停止日伪走私等。

对蒋介石在对日政策上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态度。1936年5月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重申了“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9月1日，进一步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告诉全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傅作义的信中也明确指出：“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

国民党与蒋介石从1935年底以后，已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但同时他仍在西北调集大军，准备向红军发起又一次的大规模进攻。但历史不可逆转，抗日是大势所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个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它表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已完全破产。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示：“如果（对日）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提出“抗战”这个词。同时，该全会对内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虽然在会上还通过了所谓《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但用武力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毕竟停止了。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在抗日政策上的重大变化。正是有了这个变化，才能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迎来全民族的抗战。

上述情况表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领导集团是极为特殊而又复杂的势力。一方面他与人民存在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使他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实行妥协。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存在着矛盾，当日本侵略者严重地危害他的统治利益时，在人民的压力下，又可以转过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就是从“九一八”到“七七”前被国民党称之为抗战“绪战”时期的情况。

二

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失陷（1937年7月——1938年10月）被国民党称之为抗战的第一时期。他们还将这时期划分成三个阶段：芦沟桥事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到南京失陷谓第一阶段；台儿庄会战到徐州会战谓第二阶段；武汉会战到广州失陷谓第三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民党军队负责的正面战场抗击了日本侵略军的绝大部分，是全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毛泽东同志对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抗战，作了这样评价：“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军事上的努力抗战是以政治上的进步为先导的。国民党在这时期里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外之行为”。在人民要求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民主自由方面，《纲领》也提出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与以合法之充分保证”。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上述的一切虽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存在极大距离，但与抗战前的国民党相比较，不能不是较大的进步。

就军事本身来说，在这一时期里，象台儿庄战役那样摧毁日军主力，歼敌逾万的战果，虽属鲜少，但总的来看，国民党的抗战是积极的。如淞沪会战，国民党投入了四十万兵力，几占当时国民党能指挥的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为了表示抗战的决

心，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具体地说，国民党正面战场这一时期起了以下作用：

一、打击了侵略者的狂妄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战略。

日本侵略者原以为只要用少数兵力便可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国。但在“七七”事变后，日本并未能迅速实现占领中国华北的目的，日军参谋本部被迫于7月18日制定了《对华北作战计划》。“八一三”事变发生前，日本军部原以为在10天内便可占领上海，但在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日军不得不再增加兵力，前后投入了12个师团，化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实现了占领上海的目的。到1938年1月，日本在中国战场投入的兵力达26个师团，超过它总兵力的二分之一以上。由于兵力不足，日本于1938年3月实行国家总动员法案，原定的“速战速决”战略完全破产。

二、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起着相互支援、相互依存的作用。就正面战场来说，它吸引了大批的敌人，为敌后战场的开辟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发展，破坏了敌人的后方供应，拖住了一部分敌人，为正面战场部队的整休，准备反攻，创造条件。毛泽东同志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说：“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挥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的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这就充分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积极作用。当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

四军等人民武装，在敌后积极作战，同样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如1938年春，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出击平汉路北段，使敌铁路交通一度陷于瘫痪；八路军第120师以主力四个团出击同蒲路北段，第129师在邯长公路上进行破袭战等，均有效地钳制与打击了敌人，支援了国民党的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

三、国民党爱国将士在抗战过程中的英雄业绩，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国际赞誉。

平时缺乏训练，组织装备又落后于敌的国民党军队，能否与优势装备而又训练有素的日军作战，在国际上有相当多的人对此是抱怀疑态度。而国民党中的爱国将士，在这一时期里，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滞了日军的疯狂进攻，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战略，改变了国际的视听。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是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以后在淞沪会战中，国民党第88师谢晋元团八百余人，奉令孤守四行仓库，在敌炮火包围下，始终坚守阵地，完成了掩护部队撤退、阻敌前进的任务；在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第31师官兵在池峰城率领下，经受了敌优势炮火的猛烈袭击，在敌突入台儿庄街巷并占领国民党四个碉楼的情况下，继续与敌展开肉搏战，直至最后胜利。这一切都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反响。

但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与蒋介石政治上的两面性，所以在对日作战较努力的同时，也存在动摇妥协的倾向。如“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7月8日的电令中仅指示就地抵抗，意欲不扩大与局部解决事变，因而直至7月27日前，中日双方在平津前线基本上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再如1937年11月，国民党曾接受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蒋介石也多次

会见陶德曼。1937年12月6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第54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又一次议论了和谈的问题。这些都表明了国民党对抗战的动摇。但若将这种动摇倾向，夸大成国民党在这时期的主要方面，也是不妥的。正是由于蒋介石没有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意志办事，也由于国民党官兵比较努力的抗战，才引起了日本统治者的不满。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首相的声明就表示了这种意向：“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仍然为了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之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之真意，贸然策动抗战”，“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

总之，在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较好，国民党的抗战也比较努力，因而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能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了成就。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说得好：“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那种难堪的奴役地位是改变过来了。全中国人民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已经出现了”。

三

从武汉失陷到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1938年11月——1945年9月）被国民党称之为抗战第二时期。他们还将这时期划分成三个阶段：从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到桂南会战为第一阶段；从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到第二次长沙会战为第二阶段；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

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滇西与缅北作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到桂柳反攻则是第三阶段。

在这一时期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和国民党的抗战政策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武汉后，由于占地广、兵力分散、预备兵源枯竭，已无力再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其占领区也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的发展而无法实现巩固的统治。在此形势下，日本大本营提出：“今后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然对被压缩中之国民政府如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貽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因之，有实行一部作战之必要”。在《日本陆军作战指导纲要》中说：“确保占领地域，促进其安定，以坚强长期围攻态势，努力制压残存之抗日势力，使其衰亡”。在日本的策动下，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亲英美派，虽没有叛变投敌，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所引起的恐惧，转而采取抗战不力，坚持反共的政策。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在这一时期的抗日作了如下结论：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它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在国民党编著的抗战史中，对此始终是讳莫如深的，甚至为了论证他们反共的“必要”，肆意歪曲历史，给中国共产党加上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予以澄清。这也是我们在阅读国民党提供的史料时必须十分注意的问题。

1938年11月，在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蒋介石在南岳召

开了军事会议，并邀请了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会议总结了第一时期作战的教训，接受了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在蒋介石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中指出：“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会议决定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根据国民党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派出了叶剑英、李涛、边章伍、吴奚如、李崇等参加训练班的教学工作。训练班前后办了三期。叶剑英等向数千名国民党军官，宣传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的经验。这对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日，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但不久，国民党的政策就变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虽仍打着抗战到底的旗号，但蒋介石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成“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对内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发布了诸如《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还禁止组织群众团体，限制文化、宣传工作，禁止青年奔赴解放区。接着，1939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由“政治限共”进到“军事限共”的决定。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就现有的史料看，国民党在发动反共高潮时还没有停止抗日。1939年冬至1940年3月，国民党军曾有一次大规模的冬季攻势。据国民党公布的材料说：在这次攻势中投入了第二、三、五、九等四个战区的兵力作为战斗的主力，同时组织了第一、四、八等三个战区与鲁苏战区、冀察战区的兵力配合伴

攻。整个战斗共毙敌77,386人，俘敌400余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主管情报与政务课长今井武夫说：1939年冬季攻势，是日本向中国“开战以来，未曾有过大规模的反攻，冲击了日本军”，“使日本军也得到了重新估价中国战斗力的机会”。但是在此之后，这样的攻势就不多了。如果我们查看国民党国防部所发表的历年抗战死伤人员统计表，就可能看出，在1939年冬季攻势后，国民党部队战斗死亡数字骤然下降，而且一年比一年少，直到1944年，日本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使国民党部队伤亡人数开始上升。（见附表）

时期	年 份	阵 亡	负 伤	合 计
第一时期	1937年	125,130人	224,232人	349,362人
	1938年	249,213人	485,804人	735,017人
第二时期	1939年	169,652人	176,891人	346,543人
	1940年	339,530人	333,838人	673,368人
	1941年	144,915人	137,254人	282,169人
	1942年	87,719人	114,180人	201,899人
	1943年	43,233人	81,957人	125,180人
	1944年	102,917人	103,599人	206,513人
	1945年	57,659人	85,583人	143,422人

1939年开始的反共与1940年3月后的抗战不力，使国民党战场出现了与第一期抗战截然不同的现象。

首先，出现了“降将如毛、降官似潮”的情况。据统计，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抗日期间投降日本的有70人之多。在边章五所著的《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一文指出：“国民党军队的叛国投敌罪行，在抗战初期是不多的，那时政治比较开明，军民争赴国难，国民党军官中慷慨就义，壮烈牺牲者，不乏其人。这种大批叛国投敌的现象，是从国内政治反动，特别是从皖南事变以后，才日益增加”。这些投降将领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国罪，又制造了所谓“曲线救国”论。如张荫吾为柴恩波的叛国，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及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敌，实标仍为本党作抗建×××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与日寇以重大打击也”。

其次，国民党部队的战斗力腐化起来。这一点在美国与日本的报告中都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林沃尔特说：“就中国人而言，国民党军队似乎非常乐意继续无限制地（同日本人）停火，因为他们控制着同敌占区的（走私）贸易，正在舒舒服服地发财”。德鲁姆特说：没有迹象表明国民党部队“能够或想要对华北的日本人发起反攻。中国的战略完全是防守性的，中国士兵在精神和士气方面是绝对地只着眼于防守，没有任何打进攻战的概念”。日本侵华军司令冈村宁茨也根据情报推测出国民党部队战斗力的下降。

1944年春，美国在太平洋发起越岛进攻。它严重威胁了日军的海上运输，使南洋的日军有与本土失去联系的危险。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日本必须打通在中国的大陆交通线，将中国东北至东南亚的大陆交通联接起来；同时亦要摧毁美国在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的空军基地。为此，日本调动了40余万兵力，于4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除了在湖南衡

阳曾抵抗了一个多月外，别的地方是一个接一个失败。特别是衡阳失守后，国民党部队战斗力一天不如一天。这是国民党战场自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大的败退。据统计：自4月至12月初的8个月中，日军占领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国民党在这场战斗中，丢失了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36个飞机场，损失部队50万至60万。由于日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内一度出现了迁都西康之说。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国民党部队如此败退，出于世界人士意料之外。

亦有人说，豫湘桂战役的失败是蒋介石的优先反共政策所造成的。因为当东部战线处于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仍然把他所不满的杂牌部队放在前线，而装备精良的第八战区的嫡系胡宗南部队，继续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如果这一说能成立，则正证明国民党执行错误的抗战政策，是造成豫湘桂战役失败的根源。

关于这一时期国民党与日本方面的谈判，应具体分析。在汪精卫叛国投敌以后，日本方面继续试探与重庆国民党谈判。日本政府曾命铃木卓尔中佐以驻香港武官的身份与重庆国民政府联络，这就是被称之为“桐工作”的活动。同时，华北侵华方面军司令部通过汉奸殷同（后改汪时琼）与重庆方面的王大赉建立了无线电联络。但这种谈判都因双方意见对立而没有达成协议。德意日三国同盟建立后，以中、美、英、苏的同盟也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建立。由于这两个阵营都不许单独媾和，所以国民党与日本的谈判就一度中断。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失利后，为了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又开始寻求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但战局的变化，使谈判双方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负责谈判的今井武夫曾感叹说：“作为和谈基础的战况的不

利，谈判的主导权也移到了中国方面，与大东亚战争开始前不同，日本变为期望中国提出建议的一方了”。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日本失败命运的定局，国民党与日本方面的谈判又有了变化。冈村宁茨在战后的回忆中说：“实际上对方（指国民党——作者注）并不希望日本元气丧失殆尽后停战，而愿重新谋求中日合作”。今井武夫与国民党将领何柱国谈判时，记录了何柱国的一段话：“日本国战败结果而灭亡之事，决不是中国所希望的。无宁是希望即使在战后仍作为东洋的一个强国留下来，与中国携手协力维护东洋的和平”。如果我们透过“合作”、“和平”的漂亮词语探求其实质，就会发现，在抗日战争胜利即将来临时，国民党蒋介石所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日本侵略军的力量来对付在抗日战争中日益强大起来的人民革命力量，以维护与巩固他在中国的独裁统治。这一点在当时亦是公开的秘密，正象国民党发言人对外国使节所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俄国人的“傀儡”，“一旦同日本的战斗行动宣告结束，就要立即全部消灭他们”。

总之，对国民党与日本的谈判应放在战局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这样才能对谈判的内容与实质作出合乎事实的科学结论。

综观蒋介石国民党的八年抗战，可以看出它既不是汪精卫那样的叛国投敌派，也不是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坚决抗日派，它是抗日中一股复杂的政治势力。在“九一八”事变后，它为了实现其独裁统治，抛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内铲除异己势力与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武力“围剿”，对外期求国联主持公道与对日本妥协、退让，致使日本帝国主义“蚕食”我国大片国土。“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特别是“八一

三”淞沪抗战开始,由于日本的侵略严重威胁到它的统治,也由于全中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救国,它才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战的主张,建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正面战场,成为当时的主要战场。这时日本侵略者虽占领了大片领土,但国民党的抗战还是努力以赴,国民党中爱国官兵在战斗中,也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广州、武汉失守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发展、壮大,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惧,转而采取抗战不力,坚持反共的方针,正是这一政策,使国民党部队战斗力大为削弱,在国际国内极有利的形势下,出现了豫湘桂战役那样的败退。在抗日即将胜利的前夕,又出现了蒋、日勾结,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的现象。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我们希望史学界有更多的研究国民党抗战史的论著问世。它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的深入研究。

一九八五年四月

(本文由王福年、杨树标、徐绍全、陈启后参加讨论并修改,特此说明)